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化中的石牌村/郑孟煊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
(中国百村调查丛书·石牌村)
ISBN 7-80230-044-4

Ⅰ.城... Ⅱ.郑... Ⅲ.乡村-城市化-研究-广州市 Ⅳ.F299.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2031号

城市化中的石牌村 ·中国百村调查丛书·石牌村·

主　　编/郑孟煊
副 主 编/黄绍汪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65269967
责任部门/皮书出版中心 (010)85117872
电子信箱/pishubu@ssap.cn
项目负责人/范广伟
责任编辑/程　秦　亚　非
责任印制/同　非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整体设计/孙元明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18.5　字数/278千字
版　　次/200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30-044-4/D·314
定　　价/3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百村調研顯國情其中石牌
作典型千年農耕廿年變個
中甘苦有誰明弱勢群體需
關住良知學者歷艱辛秉筆
直言創新論圖文并茂史書
成

二〇〇五年深秋讀《城市化的石牌村》三十
余万言的校樣稿，感為作者「三農」走向城市化、
產業化和現代化道路的真切灼見與整理解析
和科學總結所感動，撰寫「廿年巨變」以表敬意。

南開大學 曾絛

曾涤　南开大学教授

中国百村调查丛书总编辑委员会

主　　编：陆学艺　何秉孟
副 主 编：景天魁　张晓山　谢曙光

常务编委：（按姓氏笔划）
王思斌　王雅林　水延凯　牛凤瑞　叶南客
邓壬富　刘　敏　刘豪兴　李秋洪　宋宝安
汪开国　杜守祜　折晓叶　何耀华　陈锡根
郭书田　秦其明　赵树凯　金嘉祥　俞　萍
张卓民　张厚义　张红宇　顾益康　黄　健
曹晓峰　詹天庠　廖　逊　戴建中　魏子熹

编　　委：（按姓氏笔划）
王开玉　王春光　王恒生　王　颉　王晓毅
史昭乐　刘　倩　刘少杰　李国庆　朱玉坤
乔享瑞　杨宜音　杨海波　陈光金　陈婴婴
陈　昕　邹农俭　邹德秀　范广伟　周伟文
郭泰山　胡必亮　钟涨宝　张友琴　张书琛
张大伟　张永春　唐忠新　秦均平　秦谱德
徐建国　曹贵根　龚维彬　彭立荣　程贵铭
樊　平

秘 书 长：谢曙光（兼）　张厚义

副秘书长：王　颉　范广伟　陈光金　李国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是继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进行这项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加深对我国国情的认识，特别是为了加深对我国现阶段农民仍占总人口70%的农村社会的认识。

1988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领导小组提出，为了拓宽拓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要进行国情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承担了这项工作，指派专业人员进行策划、拟定开展国情调查的方案，并于1988年4月在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向全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开展县情市情调查”的倡议，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校、高校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响应和支持，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被列为“七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以后又列为“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从此，此项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就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起来。

1988年8月，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了41个县市作为国情调查的第一批调查点。8月在郑州召开了首次国情调查协调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开展此项调查，怎样选点、怎样调查、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与会代表对此项国情调查的重要意义目标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还就如何组建调查专业队伍等问题交流经验；会议还讨论修定了统一的县、市情调查提纲和调查问卷。

1989年5月24～25日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国情调查协调会议。会议是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开的，由当时中国社科院分管政法社会学片的副院长郑必坚同志主持，会议集中讨论了本次国情调查成果的编写方针

问题，与会者结合已写成的《定州卷》等初稿，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确定，国情丛书的编写方针是，以描述一个县（市）1949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为主的学术资料性专著。实事求是，以描述为主，要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实用价值。会议还决定，本丛书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1990 年 8 月在北京西郊青龙桥军事科学院招待所召开了第三次国情调查协调会议。出席这次会议有总编委会的主要成员和各地分课题组的负责人共 80 余人。会前中国社科院党组决定了总编委会的组成人员，主编丁伟志，副主编陆学艺、石磊、何秉孟、李兰亭，何秉孟和谢曙光为正副秘书长。经过多方协商，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总编辑梅益等领导同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于 1991 年成立以谢曙光同志为主任的中国国情丛书编辑部，专事于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该编辑部后来成为总编委会事实上的日常办事机构。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研讨如何定稿。丁伟志同志在会上提出了这套丛书要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从实地调查到写作、定稿都要贯彻真实、准确、全面、深刻的方针，并为此作了详细的阐述。经过讨论，大家一致通过这个方针，认为这是实现这项大型经济社会调查既定目标的保证，也是检验每项调查、每本书稿的标准。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会议还确定，各地的书稿定稿后，先送总编委会，由总编委会指定专家进行审阅，通过后再交出版社编辑出版。本次会议还就第二批调查点的布点问题作了认真部署。

青龙桥会议以后，各课题组对初稿按总编委会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第一批书稿陆续送到北京。经何秉孟同志为首的专家审稿组的认真审阅，丛书编辑部编辑加工，第一本《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定州卷》在 1991 年 4 月正式出版。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学家李景汉教授曾写过《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州卷则是描述了 3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49 年以后 40 多年的经济社会的变迁状况。

1991 年 4 月，总编委会在河北省香河县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的工

作站召开了第四次国情调查协调会议。其时，国情调查的第二批点21个县市的调查已在各地展开，会上总结了国情调查3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对第一批点还未定稿的几个县市作了如何扫尾的安排，对第二批点的调查和写作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特别强调从第二批点开始，都要求对城乡居民进行500～700户的问卷调查，今后问卷由总编委会统一印制，抽样、调查方法由总编委会数据组统一规定。经过大家讨论，认为强调县市调查要有居民家庭问卷调查，这是使本项调查更加科学规范，并能获得更深层第一手资料的保证。大家一致同意，从第二批调查点起，没有城乡居民家庭问卷调查及其数据分析的，不能通过评审和出版。会议上总编委会对第三批调查作了部署。

1991年9月总编委会在中国社科院报告厅举行了《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定州卷、兴山卷、诸城卷、海林卷、常熟卷首批5卷成果发布会。丛书总编委会顾问邓力群、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著名学者陈翰笙等专家学者与上述5卷的主编和调查点的党政负责同志共百余人出席了会议。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文献专家孙越生等学者对丛书首批成果作了评述。专家们对这项大型国情调查首批出版的成果都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从此，这套丛书就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1993年7月，总编委员会在中央党校召开了第六次国情调查协调会议。在会前，考虑到此项国情调查已经进行了6年，各地涌现了一批从事此项调查的专业骨干，他们都有继续长期进行国情调查，并作进一步研究的希望和要求，为了便于交流和研讨问题，经过酝酿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由陆学艺任主任，何秉孟、谢曙光为副主任，北京和各地的一部分专家（多数是从事此项调查的）为研究员，聘请丁伟志、邢贲思为顾问。在协调会议期间国情调研中心举行了成立大会。此次协调会主要是研究讨论并解决调查点的调研、写作中的问题。考虑到前两批点，调查已经完成，但由于研究分析和写作、统稿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卷的质量达不到要求（有连续三次退回修改的），而调查的材料已有3～4年了，所以会议要求，第一、二批点未完成写作任务的，都要求再做新的调查，要把近几

年的变化写进去。会议还布置了第四批点的调查。

到1994年底，有约50个县市完成了调研和写作，出版了30余卷。就全国范围说，100个县市调查的布点工作已经结束，但各地的课题组仍在继续进行调研和审稿工作。开始时总编委会商定，每个省市自治区根据人口区划的不同，部署2~5个调查点，要求选取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类型（山区、丘陵、平原等）和有各种代表性的县市，以求全面、准确的反映整体国情。1995年以后，总编委会根据各地调研的实际情况，又陆续批准了一些新调查点，以求填平补齐，使布点尽可能达到合理。另外还有一些是由于丛书出版以后，社会反响很好，有些市、县的领导主动要求列为调查点，如新疆的吐鲁番市、广东的珠海市等，总编委会根据总的布局平衡，也批准了一些新点，所以到最后全国一共布点108个。

1994年以后，总编委会的几位同志曾先后到湖北、新疆、广西、辽宁、山东、广东、江苏、云南、江西、海南、黑龙江等省区，同当地社科院、党校的同志一起走访了这些省区被调查点县市的领导和群众，听取他们对丛书的意见，也参加一部分书稿的评审会或出版后的发布会。各地对本丛书调研、写作和出版都很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不少卷被当地评为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得了奖。

从198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酝酿组织这项大型国情调查时起，直到1998年10月到最后一卷出版，历时10年零8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项国情调查任务，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进行的少数几次大规模经济社会调查之一。先后共出版了105卷，总数4000多万字。后来，经过总编委会和国情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开会评议、协商，从中减去了五本。所以，最后送交全国社会科学基金会作为最终成果的是一百本。当时预定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对100个县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调查，对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从多种角度，各个层面来提供第一手的真实准确的资料和数据，以便进一步摸准摸清我国的基本国情，拓宽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可以说，这个目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是基本实现了。这100本国情丛书，每一本都是以描述一个县（或市）的历史和现实发展状况为主的学术资料性专著，它既可以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全面研究基本国情或研究社会科学某一方面专题的资料，亦可作为进行国情教育的基础参考书，所以这套丛书既具有实用价值，又有科学研究价值。因为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真实记录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种类型，各种发展水平的100个县（市）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轨迹，这些资料来之不易，十分珍贵，所以这套丛书又具有保存价值，历史愈悠久，其价值愈可贵。

国情丛书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认为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项很重要的学术资料基本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广东省社科院的一位领导说，将来这套丛书的资料和数据能培训一大批博士，硕士出来。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也很欣赏，诸城市委的领导，在读了《诸城卷》之后，认为这部书是诸城的百科全书，应该是诸城干部特别是市委市府的领导干部必读的书，对熟悉市情，对做好工作，以及对外交流都很有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建院20周年，评选建院以来优秀成果时，给《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颁发了特别荣誉奖。

国情丛书总编委会原来有个设想，在100个县市情调查告一段落以后，要组织相应的课题组，对这100个县市调查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分门别类，进行纵向的专题研究，写出如农业、工业、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专题研究专著，最后进行综合研究，写出集大成的国情分析报告。90年代中期曾经启动过几项专题研究，但因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原因，此项研究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这是美中不足的一个方面，有待以后弥补。

1996年当百县市调查基本告一段落的时候，课题组内外的一部分专家提出，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是一项重大的学术成果，对认识国情有很重要的价值。但一个县市，上千、几千平方公里，几十万、上百万人口，所以，对县市经济社会的调查，总体上属于中观层次的调查。对农村基层情况的调查还是比较少。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大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改革，这20年，农民变化最大，农村基层社会变化

最深刻，这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命运的基础，是弄清国情必不可少的。如能在百县市情调查的基础上，再做100个村的调查，从微观层次上对这些村、乃至村里的每个农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状况加以调查，经过分析，全面系统地加以描述，形成村户调查的著作，这就更有意义了。百村调查是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姐妹篇，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相得益彰，对加深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更加完整了。对此建议，总编委会的几位同志经过几次研究，认为这个意见很好，而且很及时。于是做了两件工作：一是组织一个课题组，到河北省三河市行仁庄进行试点调查，形成村的调查提纲，调查问卷和写作方案，以便为将来开展此项调查作准备；二是在1997年7月写出了《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课题报告，向国家社科基金会申请立项，基金会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个创意很好，很有价值。但因为此时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都已在1996年评审结束，立项时间已过，不好再单独立项。后来经过总编委会同国家社科基金会反复协商，基金会考虑到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组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考虑到再作一次百村调查是百县市国情调查的继续，很有必要。所以，于1998年10月特殊批准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这个课题，补列为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并专门下批文确认，批文为98ASH001号。

“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立项后，就受到各地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原来进行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单位和专业工作者们的欢迎，至今已经有30多个单位组织了课题组，并已陆续选点、进点、开展了村情的调查。

“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目的，同样还是为了加深对全国基本国情的认识，特别是要对全国农村、农民、农业的现状和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至今仍不失为至理名言。现阶段的农民境况到底怎样？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特别是他们将来会怎样变化？中国的农村将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地区的状况是不同的。我们要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来描述反映中国50年来农村、农业、农民变化的状况。

行政村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地域单元，也是构

成中国农村社会最基础层次的政治单元。80 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村长和委员，组成村民自治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0 多年来，中国的村民自治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很多经验，造就了农村社会安定有序的政治局面，所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称赞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行政村还是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实体。它的前身是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原来在政社合一体制下，既有组织生产经营的经济功能，又有行政功能。改革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大队一级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法律规定，村委会是土地集体所有的承担者，是土地的发包单位。这些年实践的结果有多种情况，一种是有些集体经济比较雄厚的村，在村民自治委员会以外，还组建有农工商公司或（合作）经济委员会，同受村党支部（或党委）领导，村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实体，但这类村是少数。现在全国绝大多数村的状况，村已不是完整的集体经济、生产经营单位，村作为集体所有土地的发包单位，把土地（包括山林等）分包给农户，农民家庭成为自主生产经营的实体。其中的一部分行政村，还有一部分经济职能，对农业生产实行统一灌水排水、统一机耕、统一供种、统一植保等社会服务。而在经济不发达和边缘山区，行政村连这类社会化服务也办不到，只是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和土地发包单位。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已经 20 多年了，总的发展是好的，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各地区村庄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农户分化的状况也是千差万别。我们这项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就是要通过对这 100 个村及其农户的调查，对这些村自 1949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过程、变化状况“摸准、摸清”，经过综合分析，通过文字、数据、图表把这个村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实地加以描述，既能通过这个村的发展展示农村 50 年、20 年来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能展示这个村特有的发展轨迹。

现在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套与《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

会调查》有着天然联系的关于现实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成果，经与制版者反复酝酿，最后定名为《中国百村》丛书，后缀所调查的村名。每本书有一个能概括该村庄内在特质的书名，如行仁庄是一个内发型村庄为基本特质的村落类型，我们就把这一卷定名为《内发的村庄》。

《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调查》同样是一项集体创作、集体成果。参加这项大型国情社会调查的，有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大学 、党校以及党政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被调查地区的党政领导干部相结合，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并且要由被调查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配合，实行专业工作者，党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和农民群众三结合，才能共同完成这项科学系统的调查任务。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
总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12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本 书 序

“城中村”是个新概念、新词汇，《现代汉语词典》2002 年增补本还没有收这个词条。“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大中城市周边的村落，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耕地部分或全部被征用了，建设成为工厂、商店、住宅小区、道路等城市设施；村里的农民则逐渐改行成为工人、职员、商贩等非农职业者。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这里的农民已经不从事农业生产了，但他们的农业户口也即是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村落周围已经是高楼林立，街道成网，布满了各种商店和超市，但这个村落里农民的住宅格局没有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住宅前的园地也盖房了，有的住宅原来是平房，改造为楼房了，有的楼房改造成为多层或高层了，但村落居住的边界基本没有变。这里的村落已经不是农民聚居的载体了（除了原居民外，一般都住进了外来的农民工或从事各种城市职业的人），但村落的名称没有变，还继续被称为＊＊乡（镇）＊＊村，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的名称也没有变，仍然在执行着村民自治的各种功能。这种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的一种表现。从时间角度上说，城中村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阶段。从空间角度上观察，城中村是城市范围里的村庄。根据这种亦城亦村的特征，称作“城中村”是很合适的，也很形象。

城中村现象，自 90 年代中期以后，就有学者关注，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并陆续有一批论著问世。2001 年初，广东省清远市委党校郑孟煊同志和广东省社科院黄绍汪同志到北京来，同我商谈要参加中国百村经

济社会调查课题的调查研究问题，我当即表示竭诚欢迎，还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百村调查的宗旨、意义和做法。双方谈得很投机，很快达成了共识。他们回去以后不久，就给课题组来信，决定调查研究广州市石牌村。

做社会调查，选点十分重要，选得准、选得好，就成功了一半。广州市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大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区扩展很快，1978 年市建城区只有 87 平方公里，2003 年已扩展到 240 多平方公里，在这种超常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城中村。石牌村地处广州近郊，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耕地就陆续被征用，到 1995 年，耕地被全部征用，农民也全部转而从事他业。现在石牌村周围已经是广州市的繁华地区，成为电子一条街。石牌村村务管理也比较好，较早实行了股份合作制，农民转业以后，仍是村集体经济的股东，每年从村里分红，享有村集体经济提供的各种福利。石牌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实践的股份制、集体企业公司化、物业出租等模式，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一种制度创新，是农村城市化的经济基础和动力。石牌村这个城中村是广州市 138 个城中村里最大的一个，在省内外都很有名气，石牌村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的城中村。

在天河区委区政府和石牌村委的支持下，郑孟煊，黄绍汪为首的课题组住进了石牌村，经过二年多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研讨写出了这部理论观点鲜明，资料翔实丰富的“城市化中的石牌村”。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转轨。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这两个转变都发展得很快。1983 年我国有 286 个市，2968 个镇，2003 年已有 660 个市，20226 个镇，平均每年增加近 19 个市和 863 个镇；1984 年我国有 926439 个行政村，到 2003 年只存 678589 个行政村，减少 247850 个村，每年减少 13769 个行政村。这组数字正反映了我国城镇化的实践。本书叙述了石牌村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变化，叙述了石牌村怎样从一个城郊的农村一步一步演变为“城中村”的全貌，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所以称“城市化中的石牌村”。

“城市化中的石牌村”不但论述了石牌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进步的方面，也重点分析叙述了发展演化中的问题，诸如本地人或外来人混居，贫富分化，管理落后等方面的问题，还揭示了村里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和矛盾。这里既有农村转变为城市后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新关系，新矛盾，而更多的则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已经非农化、城市化，而农民的身份，房产所有关系，集体经济和村务管理还都是农村的，这种二元结构产生的矛盾，课题组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既作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中的石牌村》最重要的贡献是如实地描述、记录了石牌村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实践，洋洋近三十万字，一万多个数据，把石牌村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演变的事实和过程记录了下来，这是很珍贵的。也符合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总课题组提出的要“真实、全面、深刻、准确”的方针。前面说过，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这是一场十三亿人民参加的伟大实践，发展又如此迅猛，一时难以作出理论概括，通过各种形式，把这场变革的事实和过程，记录下来，为以后的分析总结作好基础准备，这不仅对今后的发展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年代越久远，价值越珍贵。

从已经出版的《内发的村庄》、《屯堡乡民社会》和将要出版的《城市化中的石牌村》这三本书中，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学术视角详细记述了被调查研究村庄的发展变化的实践，也都提出了一些很深刻、很吸引人的观点，给我们展示了我国各地在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发展的丰富多样性。我想，如果现在正在进行的数十个调查点都能扎实地去深入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综合分析，撰写出有理论、有观点、有事实根据的著作，每一本书都会有它的研究深度和特点，这样汇集起来，会大大地丰富我国的农村研究，会大大地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更主要的是会促进我国农村发展和现代化事业建设。

最后，我真诚的希望，《城市化中的石牌村》的所有参与者在已有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继续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去发掘、发现，去分析总结，就一定会有新的收获。真理往往是寓于最基层、最前沿的实践之中。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陆学艺

2005 年 12 月 10 日

第一章　导　　论

《城市化中的石牌村》，作为“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之一的调研项目成果，是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由农村转变为城市的历史实践为依据，进行理论与实际结合研究的结晶。为对本课题（本书）有个概括性的了解，这里对研究的主题定位及意义，研究的方法与重点，石牌村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全书的基本框架作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节　城市化的重大意义

我国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的状况，是我国国情中最基本的内涵，也是国情最突出的问题。当代社会，农村的发展，自然是多元的、多方位的，而农村的城市化，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曾指出，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① 我国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解决“三农”的落后状况，必须实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只有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农民生活素质”，“农村出路在于农村之外”。我们在“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中选择以石牌村走向城市化作为典型，从其城市化的历史轨迹中探讨其经验、教训、规律、问题。应当说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城市化是城市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人口数量，经济增长与社会活动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一般都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变量作为城市化程度的主要参照指标。国外有的学者曾把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比如 R. M. 诺瑟姆认为城市化率在 25% 以下为城市化发展的初始期，城市化发展速度较缓慢；25% ~75% 为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加快；75% 以上为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此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减慢且相对稳定。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历史发端于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数以万计的破产农民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在 1800 年以后，随着产业革命扩展，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以每 50 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到了 1850 年，比重为 6.4%，1900 年为 13.6%，1950 年为 28.2%。此后 50 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迅速增加。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 1999 年统计资料，1999 年该比重为 46%，其中发达国家为 75%，发展中国家为 40%。

一般国家其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聚集阶段（urbanization）。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中心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全面繁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区域内聚集，主要表现为中心区人口密度提高，房地产价格上涨，工厂、市场、金融机构、文化中心云集。但是城市化也造成了“城市病”，城市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第二阶段：城市中空化阶段（counter-urbanization）。当城市聚集达到一定程度，城市中心区的生活与经营成本随之上升。而交通工具和信息交流方式的革命却使得郊区生活成本下降，质量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6 卷），人民出版社，1979。

提高，住在郊区因此变得现实可行。在这一阶段，城市中产阶级将住宅向郊区迁移，而区域内的工业，一方面由于政府规划，另一方面由于城区生产成本上升，也开始向郊外发展。此时城市中心区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而郊外则形成了住宅区，造成主城区白天繁荣，夜晚萧条，出现“中空化”征兆。

第三阶段：分散性集聚的后城市化阶段。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商贸、金融等服务性行业也开始向区域外地区扩展。第二、三产业进一步向外围区域转移，导致其中心地位被新兴区域所替代，并且区域内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由于无法承担转移成本留在区域内，形成贫民窟，此时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而城市功能却十分分散，出现了分散集聚的局面。

在国际社会中，城市化相关的理论很多，但大体上有乐观与悲观两大方面。悲观论的主要代表，比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ennies，1855～1936），比较着眼于城市消极方面，认为乡村是“通体社会”，是“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特征的共同生活”，而城市是“联组社会”，是“机械的组合”，“人们只关心自己私利”，“城市社会使人变环”，悲观论者强调城市的病态方面。而乐观论者从城市对人类进步的地位与作用方面有较多的论述。比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的代表，罗伯特·派克（RobintPark，1864～1944），以及随后的路易斯·沃恩（Louiswirth）认为，城市是“人类长期发展过程积累的”，“社会有机体”，城市具有“有秩序性”，对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做了必要的肯定。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世界近代和现代史，从它的社会经济功能看，视为城市发展史不为过分。”① 在历史实践中，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必然。早在1950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80.8%，美国占64%，加拿大为62.9%，日本是37.2%。20世纪末，全世界已有约50%的人居住在城市，有另一资料认为最新预测在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第一次超农村人口，② 并预言未来20年城市人口将会增加到70%。

二　我国城市化发展概况

我国在城市化问题上，认识和实践都有较大的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1949～1960），是城市化起步发展时期，当时出于发展工业和军事上的考虑，提出要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理论上提出城市“合理布局论”，企求着重在内陆发展工业城市。这期间我国城市化程度由1949年的10.7%，到1960年为19.8%。二是60年代始到70年代中后期，是城市化的逆转时期，期间在极“左”思潮指导下，抑制城市发展，出现所谓城市是“资产阶级温床”论。因此，城市化程度由1960年的19.8%，下降到1976年的17.4%，十多年来不仅未有发展，而且是负增长。这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一个表现和原因。三是80年代（改革开放头十年）是重新启动我国城市化步伐并有较大发展时期。由于思想上拨乱反正，初步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识到“城市是经济中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下，使城市化进程有较大推进，此期间城市化程度由1976年的17.4%上升到1989年的26.2%。四是90年代以来，我国比较自觉实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时期，此期间通过总结经验，看到了前段不少地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带来的弊端，认识到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必须同步，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共同规律。因此，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提速，由1989年的26.2%上升到2001年的38%，到2003年上升为40.53%。而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省，则达到55%。这就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粗略的历史。

---

① 曾涤：《城市与产业》，中国教育出版社，2001，第25页。

② 〔英国〕《观察家报》2003年10月19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